

黄廷廷, 吴佳熹. 农业资本化及其对策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 46(9): 1-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09.001

# 农业资本化及其对策研究

黄廷廷, 吴佳熹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在传统小农经济在我国农业中仍占主导地位、传统小农经济致使我国农业竞争力不强、日韩传统小农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等这些背景之下显示了我国农业走资本化道路的必然性。农业资本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集中体现于资本化是现代农业的要求、是高投入农业的要求、是农地规模化的要求等。我国要实现农业资本化, 必须采取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改善投资的机制体制等方面的措施。

**关键词:**农业资本化; 理论; 实践;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8)09-0001-04

农业资本化就是逐步提高农业的资本投入水平, 农业资本不仅应该包括流动资本, 还应该包括固定资本; 不仅应该包括人力资本, 还应该包括物力资本、技术资本等, 既可以具体体现为物的形式, 又可以总的体现为货币的形式。这样农业资本就有着广泛性、多样性以及抽象性的特征。农业资本要素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 土地、劳动力、技术设备、物种肥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农业资本化就是在农业的生产经营中所有这些资本要素或者它们的货币形式的逐步增多和提高(耕种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高、投入资金越来越多、经验和管理水平越来越高等), 以致于使农业生产产生一个质的变化, 即由传统到现代。

## 1 农业资本化的背景考察

### 1.1 传统小农经济在我国农业中仍占主导地位

农村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初期激励效应比较显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边际效应递减<sup>[1]</sup>, 尤其是这一制度使土地细碎化、分散化, 并不能改变小农固有性质, 不能发挥农业禀赋较高的种田能手的生产经营优势, 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所以, 我国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性比较明显的小农经济。这种注重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土地均分制(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偏向性, 不可能十全十美, 正如孟子所言: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是农民增收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本来就非常低下, 而土地均分和零碎化经营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效益就更低了。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社会分工和推行科学种田, 更不会拥有农业现代化的诸多要件比如生产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商品化、国际化、生态化等等。这就使我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仍处于边缘和落后状态, 使我国的三农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 而且还有更加严峻的趋势。

小农经济规模小、资金不足、抗灾能力很弱、新型农业技术应用推广困难等不利因素使农民难以从土地上增收, 他们就半工半农而粗放经营土地(经济理性使然), 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全球化和信息化成就了世界供应链上优越产业和强势机构的话语权, 反而使本身就弱势再加上小散经营的我国农业被挤压在价值链的最低端, 风险倍增, 利润却微薄。

小农生产由于技术设备重复购置(如家家都有小型耕播机、收割机), 所以农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 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往往是国际市场上同类农产品价格的 2 倍左右, 我国每次 CPI 大涨, 都是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 小农生产使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如今年向前“葱”, 明年倒栽“葱”, 今年“蒜”你狠, 明年蒜你“贱”, 结果全是“豆”你玩, 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

### 1.2 传统小农经济致使我国农业竞争力不强

小农经济的种种缺陷导致我国农业在世界上远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就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言, 2008 年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7%, 如果与高收入的国家相比, 更是低到令人无法置信的 2%。目前, 我国几种主要的农作物的单产水平, 小麦仅占到发达国家一般水平的 60% 左右, 水稻仅占到他们的 71% 左右, 玉米仅占到他们的 67% 左右, 再者, 我国这些农产品的品质普遍较差。所以, 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较少, 进口逐渐扩大, 至 2012 年, 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竟然达到 491.9 亿美元,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45% 左右, 具体到进口粮食的数量是 7 237 万 t, 这已经打破了我国粮食自给率必须维持在 90% 的底线。进口激增的最关键原因是内外价差较大, 这又是由于我国农产品的成本较高造成的, 而成本较高又是我国农业的种植规模太小造成的。据我们对东北 98 家大豆种植户的调查, 他们的平均种植面积仅为 0.34 hm<sup>2</sup>, 与美国同类作物的单位平均种植面积相比, 仅占其 1/294, 反映到单产水平和价格水平上自然就与之相差甚远。如果说美国的农业种植规模较大与其土地广阔、富裕有关, 那么, 荷兰则是人地矛盾紧张但其种植规模却不小, 农业仍具优势的例证。荷兰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053 hm<sup>2</sup>, 比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 0.1 hm<sup>2</sup> 的水平要低到将近 50%, 但其单位平均种植规模已

收稿日期: 2017-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 16BFX126);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编号: 2016BFX016)。

作者简介: 黄廷廷(1968—), 男, 河南南阳人, 博士,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学、经济学。E-mail: hyt6808@163.com。

逐步扩大到当前的 22.5 hm<sup>2</sup>。这使荷兰农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明显,每年净出口值在 150 亿美元,排名世界前列<sup>[2]</sup>。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小农式的耕作模式必须改变。

### 1.3 日韩传统小农经济的反面教训

众所周知,日本、韩国农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虽然它们在很多方面被人们称颂,但其总体农业效率却不敢令人恭维。日本农业社会化服务尤其是农协合作化堪称全球一流,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著称于世,但日本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欧洲国家一般水平的 1/4,与美国相比,仅为其 1/8。日本 2000 年农业补贴达到其 GDP 总额的 1.5%,但是当年其农业总产值才占 GDP 总额的 1.1%。农业补贴高,自然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也高,据有关资料可知,日本大米的价格是美国大米价格的 5 倍,日本小麦的价格达到美国小麦价格的 6 倍。即便如此,日本农民还纷纷离农而从事二三产业,以致于大量的农田被抛荒、撂荒,据有关统计,日本荒田面积高达 53 万 hm<sup>2</sup>,约占其农田总面积的 10%。日本农业劳动力老化现象也非常严重,他们平均年龄将近 67 岁,其粮食自给率也不断下滑,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90% 逐步下降到目前的 40%<sup>[3]</sup>。

韩国农协社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并不低于日本,而且其政府对农业补贴在世界上高居榜首。但是其户均种植规模仅 1.3 hm<sup>2</sup>,低于日本的 1.7 hm<sup>2</sup> 水平。这意味着韩国的小农化经营比日本更加明显,所以其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都非常高,超过日本,2009 年,韩国大米价格为 50 元人民币/kg (日本为 40 元人民币/kg),牛肉价格更是北京的 20 多倍<sup>[4]</sup>。

日、韩农业的种种迹象表明,传统小农生产已陷入困境,我国农业要想发展,必须引以为戒,走资本化的道路。

## 2 农业资本化的理论研究

### 2.1 资本化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资本一直在摧毁发展生产力的一切障碍,并且努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和专业化,资本更会使产品的成本缩减到最低,因此,它便成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在农业中也是如此,马克思曾经指出:懒、散、弱的小农场主必然会被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小农会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会变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经营,也就是以积聚的资本经营<sup>[5]</sup>。

恩格斯秉承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采用农业机器和经营大农业,将会使自己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的农业劳动成为多余,因而大部分小农将会不断消失。最后他又强调:小农生产转变为专业化、技术化、社会化的大生产不可避免<sup>[6]</sup>。考茨基在其名著《土地问题》中也认为,资本化的大农业就象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一样,不仅能够发挥社会分工的积极作用,而且还可以发挥它在工商业以及银行信用中的积极作用,培养和雇佣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人才,减少劳动耗费并节省土地、灌溉和排水设施等,使农业效率大大提高。他得出的结论是新型的现代农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sup>[7]</sup>。

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认为,小农耕作的工具太原始,方法太落后、太简单,生产效率又极其低下,可以说根本提供不了“纯产品”,所以应该吸引更多的资本要素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以代替传统的小农经济<sup>[8]</sup>。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勒把农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技术停滞阶段、劳动密集阶段和资本密集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传统农业,后一个阶段属于现代农

业,这也说明了农业资本化是必然趋势<sup>[9]</sup>。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不朽之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和核心是引进和集聚新的现代农业要素,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典型代表就是资本和技术。总之,不管是农业的进化,还是农业的改造,资本化都是它们的关键词。

### 2.2 资本化是高投入农业的要求

当今时代,农业的本质是企业,企业的本质是资本日益显现。农业高投入和资本化在美国比较明显,早在 1975 年,其制造业人均固定资本仅为 5.4 万美元,而农业部门的人均固定资本竟高达 10 万美元,是前者的近 2 倍。近年来,这一反差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农业有机构成普遍且远远高于工业有机构成的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农业是高投入产业。我国状况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拿我国商品粮生产量较大的吉林省来说,农户投入资本最多的也就是 18 708.33 元,最少的竟只有 1 000 元,平均仅为 10 199.81 元。如果拿美国 1975 年的数据相比,目前吉林省农户户均固定资产投入仅是美国当年的 1/848<sup>[10]</sup>。

2003—2011 年,我国 3 种主要粮食(小麦、水稻、玉米)的生产成本由 5 655 元/hm<sup>2</sup> 增加到 11 865 元/hm<sup>2</sup>,可以说已跨入高成本时代的门槛。然而,资本投入的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瓶颈,如工厂化育苗既省工、省时、省地,又能够确保育苗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一种很理想的育苗方法,然而在实践中工厂化育苗这一方法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最主要原因就是其投入尤其是初始的投入太大,一般情况下一次性投入就需要几百万元,还不说后续的分期、分批投入,这样巨额资金一般农户或者一般大户根本无法筹集。

当前,我国只有资本密集型农业的代表——黑龙江垦区的农业耕作机械化率在 95% 以上,3 成的较大规模农场(平均资本投入在 3 万元以上)经营了 8 成左右的农田,人均每年的粮食产量达到 35.4 t,赶上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农业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此之高的农业效率使黑龙江垦区仅以全国 1/45 的耕地就满足了全国 1/13 人口的粮食需求。近年来,黑龙江垦区的粮食产量一般都高出全国水平 1 800 kg/hm<sup>2</sup> 左右,以此计算,我国仅耕种 0.87 亿 hm<sup>2</sup> 土地就可确保全国人口的粮食安全,省下的 0.33 亿多 hm<sup>2</sup> 土地就可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又可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土地的非农效益是农业效益的几十倍、上百倍)<sup>[11]</sup>。用其中一部分再投入农业,就可使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再进一步。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发展工业的空间就越大,工业发展了反过来又能促进农业的提升,至此就完全进入了农业与非农、农村与城市的良性互动之中。如此一来,高投入的资本化农业就成了我国发展的力量源泉。

### 2.3 资本化是农地规模化的要求

农地规模化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实行农地规模化经营,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农地家庭承包制度下所造成的土地零碎化经营与市场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解决农业效益极低与必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各种经济都有规模效益,农业当然也不例外(可能没有工业、商业的规模效益那么明显<sup>[12]</sup>),经营土地规模比较大,就会产生科学技术、信用贷款、市场信息以及抗风险、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优势,更有利于货币资本与实

物资本(土地、机器设备、农业技术等)、人力资本(种田大户、种田能手、农业专家等)相结合,能够获得生产、流通甚至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综合效益。实证研究证明,经济理论的预设,有学者通过调查统计,发现农地规模经营比农地分散经营在产量上要提高 20% 以上,同时在成本上要降低 5% 左右,平均可以增收 1 950 ~ 2 400 元/hm<sup>2</sup>。针对较为特殊的水稻经营而言,在小农手工劳动的状态下,稻谷生产成本是 3.6 元/kg,而在大农的机械化耕作状态下,稻谷生产成本仅需要 1.8 元/kg,成本就降低 50%,增收就会达到 3 000 元/hm<sup>2</sup> 以上。调研中还发现,某些有实力的公司到农村租入土地,实行农业规模化经营(因为大量土地荒芜,所以很容易租到土地),开发优质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不但使农民多了一份出租土地的收入,而且还使农业产出增加,农村经济繁荣<sup>[13]</sup>。转出土地以后,农民由以前的自耕小农转变为土地资产的拥有者和产业工人,既有资产收入(租金),又有工资收入,收入大大增加,党中央增加农民收入政策落到了实处,农民欢欣鼓舞,这又巩固和壮大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农地规模化非常高效,并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农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农地规模化恰是农业资本化的集中体现。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首先是土地这一稀缺实物资本的集聚,其次技术、信息、管理、人才、资金等各方面的大合拢、大融汇又是各种各样资本的交集与作用。总之,农地规模化就是一个资本的海洋,没有资本投入就没有农地规模化,当然也就没有了改造小农的出路。

### 3 农业资本化的对策建议

#### 3.1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生产内部的资本化水平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致使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硬件达不到一定的要求。我国的山地、坡地、水洼地、风沙地等贫瘠地、中低产面积大,而且水、旱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农业基础设施跟不上,更使我国的农产品产量以及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可以说我国农业生产内部的资本化水平太低,远远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扭转这一不良状态。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现阶段首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现有的水利、灌溉、防风、防沙等基本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实行农地承包经营制度之后,农村集体的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没钱管也没人管农田基本设施建设这些事,而农户自己由于力量单薄或太分散,更是由于小农意识致使以前集体时代的相对较好的各种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对这些设施完善、改造任务艰巨,需要人力、物力资源也较多。农田水利建设首当其冲,应以农田灌溉、洼地排涝、农村供水以及地方电力为工作的要点、重点,以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利用和高效利用为核心、关键,形成水电供给、渔业养殖、生态保护以及观光游览等水资源综合利用的体系,并努力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演变、发展。其次,还要投入较大的资本(包括人力和物力)对我国的贫田、瘦田和中低产田进行整理和改造,可学习日本的经验,通过平整土地、移去一部分质量差的土壤之后运来一部分质量好的土壤相互混合、掺入新的有机物质、掺入化学物质与贫瘠的土壤发生好的反

应、增施各种各样的肥料等途径来建设高产稳产的良田,有效地开发、保护和提高我国土地的生产能力。

#### 3.2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外部的资本化水平

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进军世界农业市场之后,必须按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化的农业分工,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农业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合理的措施,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推向深入。首先,应当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除了保证基本的粮食生产之外,应根据市场需要、世界形势生产比较紧俏、稀缺以及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烟叶、中草药、抗癌效果较好的水果和菌类食品如猕猴桃、香菇、木耳等),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甚至独占鳌头,从而赚取大量的外汇,奠定我国的资本基础。

其次,应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促进二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可以指引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道路,特别是城乡、工农之间的订单农业对农业种植结构有着更加具体、深刻的影响,充分体现市场、需求的引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农地规模化、农业专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引擎和前提。以前小农时代的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城市和工商业的停滞和不发展,家家户户在小面积土地上都种相同的农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甘薯、萝卜、白菜等以自给自足,农业结构千年一律,除了保生存之外很难有什么经济效益。只有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向城市、工业流动,农地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优化配置,农业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才具备条件,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面积种植各色各样的市场需求的农作物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促进农作物种植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当地雨水多、气候湿润,就应多种喜湿、耐涝的农作物,当地如果干旱少雨,就要多种耐旱的农作物。一个地方土质非常重要,不同土质适合不同的作物生长,历史上的经验说得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切忌当今许多地方政府机械模仿、全盘照抄其他先进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模式给农民造成巨大损失的做法。另外,还要注重整体结构的合理性、与区域分工的协调性,大局和局部都要关注,不能偏一向一、顾此失彼,影响农业的实质性发展。在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要避免两种结构趋同化,即粮食作物的结构趋同化和非粮食农作物的结构趋同化,促进优势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在交通发达的农区以及靠近城市的地区,应形成以商品性农产品为主、为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服务的生产结构,在传统的和偏远的农业地区应建立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为主的种植结构。在这些框架之下,还要努力提高各自的专业化水平,彻底打破经久不衰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农业生产格局,形成新型的、现代化的农业区域布局和专业分工格局。

#### 3.3 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打造农业资本化的坚实载体

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资本要素的大荟萃、大汇合,可以说是农业资本化的重要载体。农业资本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平台才有望达成。然而,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现状却令人担忧。虽然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就提倡农地流转,使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以发展现代农业,但农地大面积连片集中的情形并没有出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农地更加分散和零碎的倒退状况。其原因,一是任由农户自由散漫地流

转土地,二是缺少农地流转的媒介平台,流转双方信息不通、难以对接,更不用说进一步洽谈交易了。因此,建立健全一个良好的、良性的农地流转机制以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就十分迫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首先,应实行“市场+政府”的农地流转原则<sup>[14]</sup>。不管是我国的实践还是国外的经验,都证明纯任自由的农地流转模式达不到农地规模化的目的,这不仅是由于农地流转自身有一种分散化的倾向,还由于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流转收益不够明显,他们是不会转出土地的。应借鉴国际上法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在自由流转的基础上外加政府的引导、激励作用。政府引导、激励的方式较多,如发放流转补贴、提供社保基金、给与非农就业的优惠贷款等。

其次,应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相关制度。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种类较多,服务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一般的中介机构只牵线搭桥,由流转双方自己洽谈交易。服务程度较高的中介机构则不仅沟通流转,而且还直接从事交易、经营交易,并努力使交易达到最好效果。土地信托公司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农户们首先把土地流转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为了使流转的效益更好,可以把这些零乱的土地加以集中、整合、整理,然后再把这些状况较好的土地有选择性地转包给技术最好、管理最好、资金强大当然给付的土地租金也最多的专业农业经营者。在这一流转机制中,农户、土地信托公司、大农业经营者的利益(尤其是前者)都得到了极大保护。

我国土地信托服务开展得较晚,所以很不成熟,也不规范,我们很有必要借鉴有较长土地信托历史的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做出多方面的工作。(1)制定、完善土地信托法律法规,使其在运行中更加规范和获得更多支持。其中既包括土地信托机构的设立基础、工作方式、业务范围、财政补贴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土地流转的范围、条件、规费、变更、补偿等方面的规定,不仅要促进土地信托事业的发展,更要充分保护土地流转各方的利益。(2)培育土地流转的市场主体,促进土地信托事业的发展。与土地流转相关的主体较多,除了土地信托机构之外,还有普通农户、农业经营企业、专业种植大户、农业技术指导机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构等等,各地政府应通过就业安置、金融支持、人才引进、科技支持、社会保障等各种途径对他们进行培育、建设,使他们更愿意转出或转入土地或者更积极支持土地流转,这样土地信托机构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3)建立监督管理机制,保证土地信托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农地信托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的用途。否则,通过信托公司流转的大片耕地都成了建设用地,都开发了“小产权房”,土地信托就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罪人,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建立土地信托流转的监督管理机制非常必要,可从监管机构、监管办法、社会参与、监管责任等方面加以建构和完善。

### 3.4 改善投资的机制体制,增大农业投资力度

农业资本化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大农业的投资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应实行多渠道、全方位、多层次投入的原则,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资农业的生产和经营。首先,要不断加大各级财政支农补农资金、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形成政府投资

农业的利益激励机制以及内在的市场动力机制。在此过程中,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目前直接的、无偿的、单一的甚至有点机械的政府投资农业的模式,形成相对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努力克服政府投资所带来的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可以根据不同支农项目的特点、性质和具体对象等,采取政府财政直接补助(针对一般农户)、财政补贴贷款的利息(针对种植大户)、税收优惠(针对大户和家庭农场)、财政资金入股补贴(针对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可以获得收益)、政策性农业保险(适用于各种经营者)等各种形式,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投入农业资金的效益、效果,去除以往的弊端。

其次,要不断增加金融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农业信贷体系。这就要融合各种银行机构的力量,建立起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国家政策性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以及社会民办金融机构共同投资农业的新机制、新体制。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应制定出金融信贷支持农业的具体方案,其中应包括每年总信贷的金额、各个银行的基本数额、每年提升的比例、利息的优惠程度、期限的长短、到期之后是否有延缓期、对信贷资金使用的监督、政府的责任等等。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也应制定出详细的措施,尤其是银行实施不力的责任措施等。另外,各地还应创造条件,试探利用外资投资农业的途径。这其中上级政府、国内金融机构或者国际性的民间金融团体必须做好穿针引线的工作,同时还要注意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的贷款应重点放到农业开发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来。

### 参考文献:

- [1]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3-95.
- [2] 杜志雄,肖卫东. 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状态与政策支持:观照国际经验[J]. 改革,2014(6):39-51.
- [3] 牛山敬二. 日本农业与农村的现状及危机[J]. 中国农史,2012(1):73-87.
- [4] 周志太. 多维视角下的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2013(1):108-11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16.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6.
- [7] 考茨基. 土地问题[M]. 北京:三联书店,1955:72-75.
- [8] 魁奈.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
- [9] John W. Th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73-87.
- [10] 朱学新. 法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农村经济,2013(11):122-126.
- [11] 吴重庆. “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J]. 开放时代,2014(1):145-152.
- [12] 田传浩,陈宏辉,贾生华. 农地市场对耕地零碎化的影响——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J]. 经济学,2005,4(3):769-784.
- [13] 翟文华,周志太. 农业资本化替代小农经济势在必行[J]. 现代经济探讨,2014(10):44-48.
- [14] 郁建兴,高翔.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89-103.